

考古发现所见西周政治中的亲疏盛衰现象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西周政治，贵族家族，亲疏盛衰现象

提要：近年来，西周考古发现了一大批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和青铜器窖藏。通过对这些墓地和窖藏存续时间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大致可以分为跨越西周一代和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两类现象。分析这些遗存主人身份，可以看出前者基本都是周王室的近亲，而后者往往与姬姓通婚，属非姬姓贵族家族。结合对西周时期祖先崇拜信仰下的宗法制、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等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及其结果的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政体模式必然导致同姓、异姓贵族家族之间因亲疏差异而此盛彼衰的变化。两类现象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由此，我们提出，西周史研究中，我们应关注西周社会中发生的政治变化及其在考古学遗存中的反映。

一、考古发现的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遗存

近年来，西周考古取得了巨大收获，其中以一大批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和青铜器窖藏为代表。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出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家族的广泛存在，与相关文献记载可以互证或互补。

重要的发现有：山西曲沃县、翼城县两县相接处的晋侯墓地（时代跨西周至春秋时期）¹、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时间为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²、河南省平顶山市应侯墓地（跨西周一代）³、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时代自周初至西周晚期）⁴、河北省邢台市邢国墓地（跨西周一代）⁵、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跨西周一代，晚可至春秋时期）⁶、西安市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跨西周一代）⁷、陕西省宝鸡市**強**国墓地（根据研究，**強**伯家族世系

¹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²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1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6 的清理》，《文物》1995：1

³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⁵ 任亚珊、郭瑞海、李恩玮：《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周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103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⁶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大约为：墓主**奭**伯（文王晚年、武王、成王前期）——竹园沟 BZM13 墓主（成王后期、康王前期）——伯各（康王后期、昭王前期）——茹家庄 BRM1 墓主**奭**（昭王晚年、穆王之时），墓地存续于西周早中期⁸）、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偃国墓地（时代跨西周中期前后）⁹、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霸伯（跨西周一代）¹⁰、山西省黎城县黎国墓地¹¹、晋南浮山县桥北村先族墓地（时代属商晚至西周中期）¹²、甘肃灵台白草坡**湫伯**、**奚伯**家族墓地（时代属西周早期）¹³、陕西省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¹⁴。近年来，在周原一带又发现周公庙、孔头沟等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聚落遗址与墓地¹⁵。

其它，还有眉县杨家村单氏家族遗存，结合遗址、墓葬和杨家村一带发现的多批青铜器窖藏可知，单氏家族活动于有周一代¹⁶。

史微家族：结合铭文内容、铜器时代和考古地层关系可以推断，史微家族从商末到西周晚期一直保持高位¹⁷。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村戈族墓地，时代属商末至西周早期，墓主为戈族贵族¹⁸。

天津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墓地¹⁹，时代属西周早中期²⁰，文化因素构成既包括周文化，也有当地土著文化。

山东济阳县刘台子墓地，时代属西周早中期²¹。

二、对高等级贵族家族遗存的初步分析与研究

如果将这些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以存续时间为标准做一个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⁸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¹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¹¹ 国家文物局：《2009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¹²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¹³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¹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 编著：《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¹⁵ 种建荣、张敏、雷兴山：《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文博》2007年第5期。

¹⁶ 李长庆等：《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眉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史言：《眉县杨家村大鼎》，《文物》1972年第9期；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2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¹⁷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¹⁸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

¹⁹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²⁰ 陈雍：《天津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²¹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高西省、秦怀戈：《刘台子六号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文博》1998年第6期。

第一类，跨越西周一代一直存在，至少在西周末年还在使用，甚至到春秋时期一直未中断的，如晋侯家族墓地、应侯家族墓地、燕侯墓地、邢侯墓地、卫国墓地、单式家族墓地、虢国墓地、史微家族、翼城霸伯家族墓地、周公庙凤凰山墓地等。这类现象也见于齐鲁等封国统治家族遗存中，如临淄齐故城和曲阜鲁故城。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墓地拥有者的家族一直存在，并兴盛不衰，保持着高位。

第二类，据现有材料，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一段时间内，如豳国家族墓地、溧伯家族墓地、张家园墓地、横水倮伯家族墓地、高家堡村戈族墓地、刘家台子墓地、桥北先族墓地等。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家族迁到别处，或不同时期家族墓地葬于不同地点，而考古仍未发现等。但比较第一类墓地所展现的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所普遍具有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一点也符合古文献中关于西周时期族墓地的记载），我们是否也可以推断这类墓地的拥有家族因某些原因在兴衰一段时间后没落了，甚至消失了，因而导致家族墓地的放弃呢？

要想揭示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切入，进行分析：（一），墓地的主人分别是谁？（二），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是如何形成的，彼此之间有何区别。（三），周代的政体模式如何？对高等级贵族家族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墓地的主人是谁？

从墓地主人的家族身份看，第一类墓地的家族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周王室的近亲，如晋、应、卫、燕、邢、周公家族、虢氏家族、单氏家族等；或者是周王室最可信赖的功臣盟友，如齐、一直为王室直接服务的史微家族等。

第二类墓地主人的家族身份较为复杂，从出土铭文看，他们往往与姬姓通婚，应属于非姬姓贵族家族。如，倮伯取姬姓的毕国女子，当属非姬姓贵族家族。据《毕媿鼎》铭文“倮仲作毕媿媿鼎，其万年宝用”，推知倮为媿姓，即属戎狄的怀姓。豳与姬姓的井通婚，也属非姬姓家族。关于弓鱼国的族源，发掘者认为是古代氏人的一支，属于古文献中失载的古豳国文化，后迁到四川，与早期蜀文化关系密切²²。也有学者认为豳国是早期巴族的一支，经陕南近抵宝鸡渭河两岸，并认为太伯奔荆蛮就是投奔到古豳国²³。我们从族名徽号（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纹饰相似）、青铜人像（也与三星堆青铜人立像相似）、及其它一些特有铜器和陶器，如尖底罐等判断，豳属古蜀文化的一支，是四川盆地古文化在西周早期向北发展到关中地区的结果。关于灵台白草坡墓地主人，有学者研究认为，溧为黑姓，乃微子之后，是殷人一族的权贵²⁴。高家堡墓地中的戈族族徽铭文在商代铜器中常见，墓主可能与商人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为夏人后裔²⁵。刘家台子墓地，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和文献记载，推测墓主应为逢国贵族家族²⁶。桥北先族墓地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应为商遗族。关于天津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墓地的性质，《史记》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史记·周本纪》中封“帝尧之后于蓟”条下，《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因此，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墓地可能与蓟国贵族家族墓地有关。

（二），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统治集团的形成

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家族统治集团的出现与周初封邦建国的分封制与采邑制度密切相关

²²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²³ 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²⁴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²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

²⁶ 高西省、秦怀戈：《刘家台子六号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文博》1998年第6期。

关。西周政体的基本设计是畿外封邦建国，畿内分赐采邑。

西周“分封制”的本质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以血缘集团组织为单位进行殖民统治，在重要的战略地区实现长期的政治控制和军事镇守，并随征服区域的变化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有所调整。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回溯周代的分封时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吕氏春秋·观世》也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灭商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采邑制是赐予那些在王室直接为周王服务的贵族一定的土地、人民，即采邑，解决他们的俸禄待遇问题。

“西周时期的采邑主要集中在王畿之内。”²⁷据研究，周原青铜器涉及的周代世家贵族包括周公、虢季氏、微氏、裘卫、毛公、南宫氏、畿内井氏、华氏、函氏、中氏、散氏、檀季氏、录氏等²⁸。这些世家大族既有姬姓氏族，也有异姓氏族，如姬姓的虢氏、散氏²⁹等，非姬姓的梁其家族、中氏家族、录氏家族、微氏家族等³⁰。这些贵族家族当有采邑在周原一带，周公庙遗址、孔头沟遗址、眉县杨家村遗址、庄白铜器窖藏、任家村窖藏、裘卫诸器窖藏、录伯（冬戈）墓等等遗存，应与这些贵族家族及其采邑有关。

西周时期，通过封邦建国和分赐采邑，形成了一大批高等级贵族统治家族。这些家族根据他们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 1， 亲戚功臣类，即《荀子·儒效篇》所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叙》：“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如鲁、齐、卫、邢、应、晋、燕、周公家族、召公家族、虢氏家族等等。他们是周人的统治核心，最可信赖的力量。
- 2， 盟友类，如《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伐纣前的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伐纣之时的牧野之誓中提到的参与伐纣之战的盟友就有“庸人、蜀人、羌人、鬃人、微人、纘人、彭人、濮人”等。
- 3， 承认周人统治地位的新征服区的传统部族类，所谓焦、祝、杞、陈、蓟、逢当是这类传统部族。
- 4， 抵抗周人失败后的归附集团类，如宋、东部的一些淮夷小国、史微家族等。
- 5， 或叛或服的部族方国类，如楚、噩等。

这些贵族家族根据世卿世禄制度，原则上世代罔替，代代相袭。由此，西周政治结构也相对稳定，高等级贵族家族的权力与地位固化现象似是肯定的。

（三），西周政体运作模式及其影响

在分封制和赐采制度下，周王控制全国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就是控制这些掌控封国和采邑的高等级贵族家族。这些高等级贵族家族既有与周王同姓的家族，也有与周王不同姓的异姓家族。周王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²⁷ 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

²⁸ 朱凤瀚：《从周原出土青铜器看西周贵族家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刘士莪：《周原青铜器中所见的世官世族》，《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²⁹ 张政烺：《矢王簋盖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

³⁰ 曹玮：《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对于同姓贵族家族，周王主要以宗法制度来强化对周王权威的认同，维系凝聚力和控制力。宗法制度即按大宗、小宗分配权力和决定地位的高低、控制资源的多少，强调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当然，大宗也有义务保护小宗。其本质是以祖先崇拜为信仰和政治指导思想，以共同祖先下的血缘关系为建构政治关系的核心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贵族在周王朝的权力地位、信任度和向心力大小。通过祖先祭祀活动和在宗庙内进行的各种礼仪活动来重申、强化这种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合法性，并在活动中不断强化参与者之间的等级地位和从属关系。

姬姓周人统治集团与异姓贵族统治集团则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异姓贵族家族或传统部族势力通过互嫁互娶建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拟血缘关系纽带，以此加强控制，获取支持。

除此之外，周王对各异姓部族势力，尤其是缺乏传统亲密关系，甚至是不能完全信任的方国部族还采取了政治、军事手段监控的措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也。在西周金文和文献中，高级贵族有称“侯”的，如晋侯、燕侯、应侯等，他们往往“侯”、“伯”称呼互见。也有只称“伯”的，如邠伯、溧伯、邶伯、霸伯等。两者之间似有某种微妙的区别，从所在地理位置看，称“侯”者一般都分布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或处于面对四夷，保护京畿的战略要点位置。从墓主自身看，正如前面分析的，称“侯”者基本属王室近亲集团，而称“伯”者情况复杂，各类贵族家族都有。分析古代文献记载可知，“侯”称往往具有军事意味，如斥侯，军事活动之前哨也。傅斯年曾指出：所谓西周五等爵制之说与《尚书》、《诗经》和金文资料均不相符，公伯子男是一家之内论尊卑长幼的称谓，原义并非官爵，也无班列，侯则是由射侯发展的武士之义。金文中侯伯二称最常见，傅氏主张“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即君临戍守的因国食邑为侯³¹。此说有理，称“侯”者当为周王亲近可靠之人，据战略要地，以同姓监视、统领异姓部族、附庸，双方一起又共同对付敌对的反叛势力和周边的四夷。晋侯与邶、霸紧邻而处，燕与蓟相距不远，周原范围内同姓、异姓家族交错分布，这类微妙的地理位置关系，反映的应该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控制模式。

《礼记·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张天恩先生认为邶为晋的附庸³²。据《左传》，春秋之时，鲁国仍有依附于自己的这种小国。

西周政体模式的影响

从积极意义看，西周初期形成的政体模式适应传统血缘社会环境，强化了统治家族彼此间的认同和凝聚力，保证了社会稳定和周人统治的巩固。

另一方面，这一政体模式的长期运行必然衍生出另一些负面影响。首先，封国之间，随着时间流逝和人口的大量增加，早期封国与王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宗法制度的向心力、凝聚力越来越弱，诸侯国越来越独立，僭越现象越来越多，在犬戎入侵直捣王室的外力作用下，导致东周列国并争的局面出现。可以这么说，东周列国并争的局面在西周政治制度设计中已埋下了种子。

汉初分封制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参考例证。西汉初年对功臣大分封，出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等诸多异姓封国。为了巩固皇权，防止分裂，西汉中央政权首先是消灭了秦末战争中形成的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同姓诸侯王，如荆王、楚王、代王、齐王、梁王、吴王等，并立下“非同姓不王，非功不侯”的誓约。但同姓封国也不能保证同心同德，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于是，景帝时接受晁错“削藩”的建议，通过平服同姓的吴楚七国之乱，削弱各封国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武帝时，继续削弱各刘姓封国力量，中央集权得以强化。

³¹ 转引自许倬云：《西周史》，第161—162页，三联书店，1994年12月。

³² 张天恩：《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汉代如此，西周恐也难免。

其次，同姓家族在宗法制度下受到大宗的特别信任和照顾的同时，异姓贵族家族必然逐渐受到排挤，利益受损现象必然出现。随着周王室统治的稳固和控制力的强化，异姓政治盟友与姬姓统治集团缺乏血缘纽带的问题日益突出，异姓贵族家族渐渐被疏离，其政治地位和作用日益弱化，甚至在核心地带被消灭和取代。

过去一般视周代大贵族家族世卿世禄的稳定为当然，但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西周政治结构和贵族家族政治命运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固，尤其是与血缘宗法制度存在本质矛盾的非姬姓贵族家族。随着周王王权的强化和周人对灭商后新占领区统治的稳固，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日益强化，损害异姓家族利益的现象日渐严重。扶风五郡周生簋、尊铭文就是一个反映同姓间相互庇护，谋取家族私利的典型例证。

2006年11月扶风县城关镇五郡出土一座西周时期青铜器窖藏，内含一对大口尊、5件编钟、3只斗、两只簋、一只残鼎、12支铜矛、一组车马器、一个汉白玉杖头，其中车马器共有103件，有铜管、铜泡等27件（组）青铜器³³。在这批青铜器中的5件器物上发现了250多个铭文，其中两个大口尊里面都有铭文，各114个字，内容完全一致。与过去出土的“五年珣生簋”，和“六年珣生簋”铭文记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的事件。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为：一位名叫珣（diāo）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司法机关前往珣生的庄园调查，朝廷指派的是一位名叫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珣生便想贿赂召伯虎让其网开一面。于是，他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并请召伯虎的母亲及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给召伯虎说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保证事情办成，珣生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答应了珣生的请求，放了珣生一马。为表达感谢，珣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六年珣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珣生的这个官司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珣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珣生。珣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³⁴。

铭文内容涉及到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在这场官司中，珣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珣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珣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珣生开脱罪责，一二再，再二三地干预司法。

除上例外，绛县横水墓地中**佣伯墓**规格低于夫人**毕姬墓**反映的也应该是这种同姓与异姓贵族家族政治地位的微妙差异。

M1、M2是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中规格最高的一组墓葬，为一组夫妇异穴排葬墓，南北相距4米。时代为西周中期。其中**M2**墓主人为男性，铜器上有“**佣伯**”为自己做器的铭文；**M1**是女性，在4件铜器上有“**佣伯乍畢姬宝旅鼎（盘、簋、）**”，是**佣伯**为其来自姬姓**毕国**的夫人所做的铜器。两墓相比，**M1**墓口（含墓道）长26.65、东宽3.2、西宽4.4米。**M2**方向与**M1**一致。墓口（含墓道）东西长22.3、东宽2.84米、西宽3.74。**M1**较**M2**墓道长，墓扩大而深，椁室用材更讲究，椁内布置也更华丽，随葬品更丰厚，随葬品等级更高。此外，**M2**的墓主人还为俯身葬。这些现象在商周时期普遍的男性墓葬规格和随葬品高于女性墓葬的夫妇并穴合葬墓中都是较为少见的。

至春秋时期，晋、郑、鲁、邢、应等同姓封国均兴起于中心区，而秦楚吴等异姓国家都

³³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厅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³⁴ 李学勤：《珣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文物》2007:8

高西省：《简论扶风五郡西周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06期

只能兴起于周王室控制力较弱的周边地区和周王室权威衰落的西周晚期以后，不是偶然的，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已埋下伏笔，是西周政体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相关考古现象的解读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西周政体模式必然导致同姓、异姓贵族家族之间此盛彼衰的变化。我们以此思路来解读前面所看到的考古现象，就比较好理解了：同姓、关系亲密的贵族家族一直活跃于西周政治中，故他们的家族保持兴盛，家族墓地的使用持续不断。同时，许多异姓贵族家族随周人政权的巩固而不断削弱，甚至消失，弓鱼国墓地、漂伯家族墓地、逢伯家族墓地、张家园墓地等的中断可能就是这一趋势的表现。

杨国似也发生过同样的变化。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63 号墓出土杨姑壶一件，李伯谦先生通过研究，认为“将杨姑壶铭的‘杨姑’解释为姑姓杨国女子的自称似较将其视为嫁女杨国的姑姓女子的称谓更为合乎情理。”从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永凝堡遗址来看，很可能就是杨国遗存，但包括一前一后，一早一晚两个杨国，国姓有别。早期为姑姓杨国，后来发生政权变更，被姬姓杨国代替³⁵。其说甚是。

同样，据文献记载，周初曾封神农之后于焦，建立姜姓焦国。文献中又有一召公之后的姬姓焦国。焦在今陕县、三门峡一带。考古发现在三门峡一带有西周晚期虢国都城、墓葬遗存。姜姓焦国、姬姓焦国和虢国之间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是否演绎了同样的异姓贵族家族衰败，同姓贵族家族取而代之的故事，值得深入研究。

2011 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现后，李伯谦先生提出早期的曾侯与晚期的曾侯不是同姓，早期曾侯用日名，非姬姓，晚期曾侯属姬姓，这种更替发生在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内³⁶。如果放到本文所讨论的西周政治中的亲疏盛衰大环境中，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过去，我们的西周史研究，基于世卿世禄的思路，认为西周一代各个贵族世家世代相袭，没有变化，因而忽视西周政治活动中生动的、具体的、反映人性的政治斗争和不同时期的政治变化。同样，我们在研究西周聚落时也应该注意，一个遗址的遗存往往是经历早中晚期二三百年的时间才堆积形成的，过去，我们往往认为遗存背后的人——某个家族一直未变。但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可知，实际发生的历史未必如此，中间可能发生过遗址主人的兴衰更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原、丰镐遗址家族墓地与遗址交叉叠压，周公庙甲骨灰坑的形成和建筑基址的毁弃等现象，可能都与不同家族的兴衰和更替有关。过去，我们曾提出凤雏甲骨文的创造者是投降了周人，并为周人服务的商人，周公庙遗址早晚期之间的主人可能发生过变化³⁷。周公庙刻字甲骨的如此破碎并埋藏于建筑毁坏后形成的垃圾坑中这一现象很值得细细推敲。我们认为，周公庙、周原凤雏甲骨性质的研究不仅要从文字内容，还应从埋藏环境的形成及其背后的人及其行为角度来研究。而后者恰是考古人应该做，但往往忽视的。

（本文原刊载于《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³⁵ 李伯谦：《也谈杨姑壶铭文的释读》，《文物》1998 年第 2 期。

³⁶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³⁷ 徐良高：《周公庙遗址性质杂论》，《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 年。